

# 文化对话、文明交融——现代中国发展、和平与人类未来的伙伴关系路径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学标注)

柳比沙·米特洛维奇<sup>[1]</sup> / 尼什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  
尼什(塞尔维亚)

**摘要:**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战略,即文化对话和文明融合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伙伴关系的途径。笔者首先回顾中国文化与文明历史,强调其深度、广度及伟大成就。之后探讨毛泽东逝世后的现代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和习近平等改革派领袖,为中国的内政外交奠定新的发展战略。笔者就此重点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主要依托于教育、科学与第三、第四波文明发展浪潮下先进技术等方面快速且高质量发展,以及经济自由化与社会政治关系民主化;“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通过与世界合作的伟大开放,通过伙伴关系追求人类普遍福祉、人性全球化、多极化秩序与世界和平。

**关键词:** 中国、新领导人形象、文化与文明对话、“一带一路”、人性全球化、世界和平发展伙伴关系

---

[1] ljubisa.mitrovic@filfak.ni.ac.rs

世界未来的统一者不会是某个西方国家或西化国家, 而是中国。  
——阿诺德·汤因比

中国的故事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故事。  
——杰弗里·萨克斯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崛起是美国必须适应的现实。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愿景》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古丝绸之路, 和时兴, 战时衰。“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 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 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更不会强加于人。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充满挑战与地缘政治动荡且全球由单极向多极世界转型的时代

现代人类正面临着科技和信息革命力量的崛起, 其参与者为先进技术领域顶尖专业人士与新一代互联网创新开拓者。这些新生产力势力致力于全球化, 并为可持续发展、团结与世界和平打开未来之门。他们与巨量资本及其追随者与中间人构成的阶级垄断力量相对抗, 包括现代技术官僚、政治官僚、媒体官僚和军政复合体。这些力量试图将资本权力及其全球霸权绝对化, 并将“灾难资本主义”的单极秩序进行垄断化和保守化(Naomi Klein)

。因此世界系统不同部分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加剧，全球南北实力分裂日益凸显。从乌克兰到中东的这些冲突似乎不仅是新冷战时代的序幕，更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日常政治分析人士和宣传人士想通过给战争机器车轮的“润滑”来掩盖这些冲突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眼前，战争机器大规模地摧毁人类生命和文明成就，转入新形种族灭绝、城市灭绝及生态灭绝。认真的研究人员、未来学家和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乌尔利希·贝克、阿尔文·托夫勒、埃德加·莫伦等人在其研究与新闻著作中不仅指出因果矩阵，而且指出其大趋势以及当前冲突与发展趋势的真实本质——现代矛盾与冲突的结构性危机决定论，也是现代系统性变革——从单极世界秩序转向多极世界秩序，包括后资本主义取代掠夺性凶残资本主义，成为人类新的发展与文明选择。

换言之，人类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不仅需要当代危机做出新的智力反应，更需要新一代的新形式社会参与和斗争，为人类与地球赢得和平、可持续进步以及生存的可替代方案。

## 中国文明文化历史及其渊源伟业概述

如今，中国是仅次于印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约15亿人口。1978年之前，中国只有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到2011年，城市居民数量在其历史上首次出现突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估，到2030年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21世纪的中国历史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也是国内多元化与面向世界全球开放的历史。

叶朗、朱良志编写的《中国文化读本》是中国文化百科全书,它深入描述了从智慧、信仰、创造力、交流、艺术与美,到民俗与生态等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意识的发展。书中我们可以了解自孔子时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丰富与深度,尤其是著作《易经》,探讨作为中国哲学基本主题之一的天人关系。我们将在神圣与道德的哲学中认知善、仁,即尊重生命、强烈的生态意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挑战性哲学,因而人应当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孔子认为,教育是提升个人精神世界的前提,教育应服务于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中,以促进世界和平友爱。

在中国古代,他创立了泛神论哲学,即泛人文主义、世界主义的哲学。其核心是所有存在(种族、民族)和事物的统一:仁和人类普世认同。重点关注每个存在和事物都有其存在本质,即存在意义(法语词汇raison d'être),这应当得到认可与尊重。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多样性的丰富与统一秉持开放与包容的胸怀。中国作为先进的海洋与陆地文明,不仅致力于贸易往来,更加关注不同民族与文明的共存以及和平文化的传播。对此,从永乐大帝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即可证明。永乐大帝特意嘱咐:信守天道、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Lang, Liangzhi, 2022, 第137页)。这对于建设现代中国和平政治仍具有现实重要性。当欧洲经历黑暗(中世纪)时代之时,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当时地球上最开明、最先进、最佳治理的帝国(Durant, 2006, 第80页)。

孔子对于中国的政治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杜兰特曾写道,孔子是中国最重要的象征,其规模之大堪称“天下大同”。孔子的神圣哲学被视为道德与教育哲学,这也是人类不断前进的过程。孔子曾提出道德与政治哲学的金科玉律:以直报怨,以德报

德(Crnjanski, 1923, 第25页)。人民最大的幸福就是智者治国而无知者不得担任公职(Durant, 2006, 第27页)。孔子的追随者意识到其伟大,预见到其思想对塑造中国人社会品行及智慧所产生的影响。对于这位思想家对中国发展精神和历史所留下的影响,杜兰特写道:从来没有任何人像孔子一样将自己的名字书写在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之上。

对于孔子哲学,叶朗和朱良志写道:儒家的仁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共情、人间关爱之情,即泛众爱、爱人(Lang, Liangzhi, 2022, 第211页)。

另一位对中国文化及东亚社会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是佛教创始人、光明与启蒙的象征——佛陀。他是个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与化身,其座右铭:化身为灯,为他人奉献光明与善行的能量。佛陀以其永恒的光明能量为世间驱散黑暗、开悟启蒙,是东亚文明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智者。

阿诺德·汤因比在其著作中描写中国及其历史使命,强调西方传统是民族主义,而中国则是普世主义的,未来属于中国。他相信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西方世界并未能恢复其曾失去的政治团结,同样也无法恢复世界其他地区的团结,而中国的命运不仅是为其所在的半个世界,更是为整个全世界提供政治团结与和平。汤因比指出,使中国能够统一世界的决定因素与重要资产不仅是地理位置,更是文化基础,包括:

1. 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的经验,这已实际成为世界强国的区域典范;
2. 漫长的历史篇章里中国人民所具备的普世精神;
3. 儒家世界观的人文主义;

4. 儒家与佛教的理想主义；
5. 人类统治宇宙企图注定落空的意识与神秘感；
6. 坚信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处, 而非试图主宰；
7. 勇于积极竞争、挑战西方, 以和平方式恢复人类秩序从而实现普世团结；
8. 中国人并非是一个具有侵略野心的民族, 只有在必要自卫时才会加入反抗行动。中国人保留着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普遍世界主义(Toynbee, Ikeda, 2005, 第147页)。

法国科学家、历史社会学代表人物雷蒙·阿隆在其著作《国家间和平与战争》(1962年第一版、1984年第二版)一书中论及中国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悠久的文明, 共产主义领导的中国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地位显著, 特别强调正是一党制人民国家创造了中国巨人(Aron, 2001, 第332页)。

彼得·伯格在《多面全球化——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一书的序言中论述了儒家新教现象及其对中国当代政治精英的再生产与流动性的影响。

如今, 许多研究学者在卸下意识形态负担的情况下, 研究中国历史及其在现代性中的角色, 对于中国长城及其丝绸之路战略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与象征意义, 强调中国不仅防御外敌, 也向世界开放, 包括经济与贸易开放, 通过贸易交流过程感受文化适应, 改进自身技术与工作组织, 同时为人类和世界带来技术与经济创新。如此根深蒂固、高度宏伟的文明始终在转型与现代化进程间架起成功桥梁, 征服人类璀璨的巅峰。

## 中国历史概述——从革命到嬗变(邓小平的角色)

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极大扩展了革命中社会阶级和政治运动的战略伙伴关系概念。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依靠农民,因当时社会结构中工业不发达且工人数量少。从纲领而言,这场革命建立在反封建、反殖民解放斗争的统一基础之上,换言之,广大人口中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无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宏伟目标。因此必须实现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战略联盟。从纲领角度来看,这场社会政治革命为土地改革及反殖民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激进的计划。也正是这样的纲领,革命才能唤醒中国民众参与社会与政治解放的主动性。这场革命的结构毫无争议,尤其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结果中,无论政府是否实行一党制。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任领导班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挥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使得思想教条化、政治保守化,导致国家陷入新的矛盾路口。为打开空间、释放民众积极性以进一步发展,必须进行彻底改革(Marek, 1965)。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接任中国领导人,开启经济改革并恢复中国与西方关系。1979年中国政府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经济开始由中央计划经济和国有工业,向生产服务企业国有私有混合制发展。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增长迅速,同时也伴随着转型。

邓小平将中国从毛泽东的教条主义和文革行动者(毛泽东的继任者)的讲话中解放出来。经济社会自由化、现代化、民主化道路均已铺平。当时重点关注科学、技术以及教育政策,作为新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积极发展、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因素。

表1:中国海外留学生数量

1978年50名大学生。
1984年14.000名大学生。
2010/2011年157 000名大学生。
2011/2012年194 029 名大学生。
2021/2022年500 000名大学生。

资料来源:引自大卫·兰普顿《追随领袖》一书1978-2012年数据(Lampton, 第23-24页),最初基于国家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门户开放资料:中国2012》。对于2021/2022学年学生人数数据,作者引自保加利亚巴尔奇克《中国与巴尔干多元文化对话》会议所发表预测。

大卫·兰普顿在《追随领袖——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领导中国》一书中探讨了中国革命进程以及领导人作为国家领袖与社会改革转型推动者的作用。作者特别关注邓小平的回归与平凡,以及他在构想中国社会与国家的改革、自由化与现代化纲领以及党的作用方面的功绩:

1. 从战争革命到和平发展;
2. 务实的实验主义;
3. 市场物质激励与国家社会平衡;
4. 新的人口发展政策;
5. 教育作为建设培养经济政治人才的因素;
6. 维护共产党统治地位,但同时转变其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
7. 从独裁到向世界开放,利用全球政治中的相对优势与相互依存关系(Lampton, 2015, 第18-28页)。



邓小平政治发展哲学成果为三大战略决策,这决定了现代中国的未来:1、经济自由化并重申市场作用;2、社会民主化,重新认识政治政党的作用;3、面向全球开放。邓小平明白政治与政党不能像集权体制那样对生产者与公民拥有无所不能的权力,而应当在社会中起到激励、引导以及解放的作用。当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番话蕴藏着对政治、政党和社会新认知的种子,这指向一个比一党制更具有参与性的全新体制,至今仍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第五代领导人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Lampton, 2015, 第226页)。在改革的背景下,大卫·兰普顿在《追随领袖》的研究中指出,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出现了三种理想的领导者类型,即改革性领导者、交易型领导者与权力执行者。兰普顿指出,领导官员的教育水平不仅在经济领域、更在政治领域发生变化,当今第五代领导人(大多数出生在五十年代)中73%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国外留学人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担任副省长或副部长的党外人士数量也在逐步增加(Lampton, 2015, 第33页)。

应当指出的是,邓小平的战略举措不仅带来了经济领域的重大转变,也对政治体制、社会变革、城市化、对外关系、社会多元化以及领导体制与领导层民主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管理结构更加专业化,各级社会组织教育文化和专业精神也得到加强。邓小平作出了重大战略决议,据大卫·兰普顿表示,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在领导人主导地位减弱、官僚机构和社会更加多元化并赋予更多权力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在国内外掌控自我(Lampton, 2015, 第44页)。

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1997)一书中准确预言“中国未来的进步,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精

英如何巧妙地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将权力从当前一代移交给年轻一代的问题,以及处理经济和政治体制之间日益紧张的问题”(Brzeziński, 1999, 第152页)。

## 习近平作为中国现代化新浪潮的领导人——不同文明交融、人性全球化、世界和平文化的计划和战略

我们正生活在人类的转折点中,包括新自由主义范式与单极全球化的危机、寻找全球多极世界发展的可替代方案。在此,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对话以及不同制度间的融合将成为现实。

事实证明,一种发展战略和一种理论的支配地位会导致世界上出现新的帝国主义、干涉主义以及暴力与战争冲突。因此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要求实现人性与和平全球化以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正如2019年达沃斯世界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所要求的“全球化的重新道德化”,因为当前不对称的全球化模式导致世界社会区域不平等急剧扩大,必须予以改变。

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美国对危机僵化式应对以及国际关系中保守主义政策回归倾向,这是对当前挑战的无效应对。现在,是时候对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批判性审查,并放弃不对称全球化单极概念,这一概念是为大西洋主义联盟巨型资本与企业巨头(TNC)服务。只有在社会民主发展战略的平台上才能建立团结的联合型社会关系与权力,这将确保:全球正义与世界和平、可持续和平发展、不同民族与文明的共存以及不同体制的融合,为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人类幸福未来铺平道路。

习近平提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为各国人民实现民主进步、责任和伙伴关系以实现人类可持续人道发展提出并开拓

道路的典范。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货币主义和赌场赌博经济等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反,今天的中国正发展实体经济能力,是传统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进程相辅相成的典范,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成功增长与发展。在此背景下,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欧洲及巴尔干地区的声誉与日俱增。

《构建人类共同未来》塞语译本收录了习近平自2013年初至2019年3月所撰写发表的85篇文章与演讲。当时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演讲时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9月7日),强调连接东西方文明、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以作为进步的必要条件。对此倡议,除其他事项外,习近平写道:这项倡议源于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习近平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领导人圆桌会议上的这段讲话(2017年5月15日),更加紧密地指出这一新平台的纲领和国际经济政治合作关系发展战略,以推动文明进步,促进和平、创造更加美好的共同未来。对此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共同为世界造福公益…尽管主要面向亚洲与欧洲,但也不排除世界任意一国、任何一方(Xi, 2023, 第531页)。该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在世界四方构建了互联互通的产业合作网络,事实证明这不仅对中国、也对全世界有利。《构建人类共同未来》一书阐述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共同奋斗的纲领,主张和平共处、结伴同行、共建人类共同未来。其中习近平指出,中国梦不仅仅是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和平、发展、合作、普遍福祉的梦想…中国人民始终相信世界好中国才好、中国好世界才好。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发

展,努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可持续(Xi, 2023, 第51、507、612页)。

当代中国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束缚,翻开了“一带一路”战略新篇章,通过各种制度的融合,为世界可持续和平发展打开人类未来大门。中国人明白,人类的发展和未来只能通过对话而非文明冲突来构建。今天,中国利用传统与儒家哲学以及新教(儒式新教)的潜在协同作用,作为道德与社会团结、工作与职业道德、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及第三、第四波文明发展浪潮下新技术力量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今天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排他性与政治宗派主义,而是在文明与国家之间建立桥梁,尊重其自治/主权与文化多样性身份(Mitrović, 2022, 第152页)。

我想以“新儒家、新儒教”一词来定义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哲学,这基于传统与现代化、道德与社会团结、劳动爱国主义等价值观的综合。因此,人口众多的中国群众所释放的创造能量创造了奇迹。中国遵循先贤道德教训,在“百花齐放”的平台上,“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以及融合“一国两制”的理念,以向善和给予的力量与自我及世界竞争,为国家发展与现代人类发展作出宝贵贡献。如今,超过50万中国高中毕业生在世界顶尖知名高校接受学术教育。之后大多数硕士博士回国积极参与本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他们似乎预示着中国领导力巨大崛起以及世界政治精英循环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学生来到中国留学。

彼得·柏格在其《多面全球化——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一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全球化的文化动态,指出文化杂交混合现象,并引用中国及其成功的经济侨民案例,其文化是由西方传统个人

主义与当代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形成。柏格指出：就中国本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言，可能会出现杂交混合的案例，类似于最近流行的儒商、受教育商人的概念(Berger, 2002, 第18页)。

“一带一路”口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只有同步发展、拓展经济带才有战略突破推进的机会，才能征服新的文明发展视野。否则会被环境的不发达而奴役。中国这一战略用社会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只有现代人类各部分均衡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现代人类可持续发展。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世界和平，巴西总统卢拉曾警告说，没有全球正义就没有全球和平。不幸的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全球化是已经开始的未来，但现在分布很差(В. Гибсон)，其中存在社会学悖论：超技术进步与社会不发达之间的二分法(M. Кастелс)。因此，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伦用“现代人类因其不够人性而陷入危机”来定义当代危机的人类学方面。

意大利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定义了传统与目标/理想之间的关系，即在谈及提其所领导运动的纲领时，他说我们走得远因而看得远。在这个关键精神视野中，人们可以破译解释中国现任领导层与传统的关系，即在当代社会行动者的计划和实践中理解并建立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互补关系。换言之，摆脱意识形态教条主义与政治宗派主义，在后毛泽东时代向中国和世界社会多元化力量/潜力开放，中国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新发展理念与千年愿景。

这一概念的哲学基础是以新马克思主义精神重新定义的趋同与世界体系理论。这由现代劳动世界的多元理论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组成，以作为技术与社会总体进步的新生产力与未来多

样多元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正是在此平台之上,中国解放社会发展生产力,以新的教育科学与新技术并结合自身与世界发展成果,解放社会生产力以实现巨大发展进步,如今已成为超级大国,是当代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领先国家。

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近三十年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超10%的国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历史中增长率最高(Zakaria, 2009, 第88页)。(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亚洲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德拉甘娜·米特洛维奇博士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对于大多数南方国家和崛起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保持高顺差。中国在172个国家中拥有12000个项目,总价值613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最大投资者或债权人之一,其货币已国家化。同时中国也是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力量联盟的中心。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共同倡导克服单极世界、实现多极世界的理念,受到世界各国的好评(Mitrović, 2023, 第11页)。中国是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大学和科学博士数量最多、现代技术领域及第三次浪潮下生产力发展创新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也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与核潜力的国家。因此,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而是各方面的榜样。中国的政策向全世界开放,同时尊重自身民族与解放传统,在今天则意味着挑战。中国对全球化进程持开放态度,以和平共处的政策为世界多极化发展作出贡献。这样的中国将在十年内威胁美国,并在众多创造力与发展潜力领域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诺姆·乔姆斯基、法里德·扎卡里亚等)宣传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美国实力衰落/离去的世纪里,中国世纪即将到来。

如果说按照革命实践的辩证法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论点,那么真理的真实面目就由其与实践中的成果实施来证明。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说中国的融合战略已经在实践中证明其优势,通过第三、第四波文明发展浪潮下产业与新技术的实体经济能力的比较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摆脱贫困。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的科技、经济以及社会均取得巨大进步。现代中国的发展使其成为令人尊敬的参与者与全球领导者。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模式,倡导改变新自由主义不对称全球化,其功能是绝对化大资本权利,建立人性化社会民主主义全球化模式,包括将世界关系由单极向多级转变(Sklair, 2002, 第244-271、311、322-326页)。

塞尔维亚支持并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在平等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发展健康的经济与坚固的友谊与政治关系。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主要以直接投资和经济伙伴关系为主。如今有众多中国公司在塞运营:矿业领域的紫金RTB Bor与河钢斯梅代雷沃钢铁厂;中企参与建设的匈塞铁路建设项目;中企CMEC从事科斯托拉茨B能源项目建设。中国首笔重大投资是修建跨多瑙河大桥。中国企业还参与了塞尔维亚11号走廊新高速的建设。2017年中国银行在贝尔格莱德开业。中国与塞尔维亚签署了农业、贸易和旅游业联合行动与投资备忘录。高等教育、文化与科学领域合作也有所增加,两国外交关系处于最高水平。

中国是维护主权、国际法与世界和平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联合国建设新型公正民主的多极世界中发挥着积极建设性的作用。这样的中国可以成为巴尔干地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的坚实伙伴。因此当今推动对华关系符合巴尔干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改善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 中国 - 时代的巨人即将崛起

伟大的法国诗人、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曾写道, 没有比时机成熟的理念更强大的东西。即使在今天, 当我们谈及现代中国及其未来愿景和使命时, 这种思想仍然可以被诠释。

人口众多、广袤辽阔的国家, 向世界敞开大门, 并威严地屹立。它成为了榜样之国。这是一个受教育人数最多、拥有先进高科技、经济增长最快、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其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拥有的创新者和创造力数量也遥遥领先。其领导人相信人类共同未来的构想和人性全球化, 秉持着对话不同文化的策略以及融合多元文明、社会文化认同和制度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不以武力威胁世界, 而是通过辛勤工作征服世界, 传播和平、合作、泛人类主义文化, 唤醒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复兴和未来的希望。这一发展战略是在儒家与佛教思想、传统与现代化中国的综合基础上形成的, 成为了世界新哲学发展的引领者: 实现“善行力量”(Goleman, 2016),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共处的合作。这个国家相信, 知识通过与他人分享而增长扩散, 善良则通过奉献和团结传递。今天, 他们的领导人相信甘地关于和平与发展之间联系的思想——即“和平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 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和平研究确定了这场革命的非暴力性质。这场革命正在一直发生; 我们的工作是在扩大其范围和规模。这些任务仍在进行, 并将在未来持续下去: 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能胜任”(Galtung, 2009, 第377页)。

唐朝诗人李白, 在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梦想和歌唱, 留下了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的诗歌杰作。这些作品将人的灵魂与世界宇宙、大地与天空相互连接; 而那些凝望着人类灿若繁星的未来人



民,确实是唯一拥有泛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能量,并有机会成为多极世界的真正统一者的人。阅读其诗歌,我们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强烈融合,感受到中国人民在交融并实现儒家仁爱道路上的梦想与自由精神,作为生活哲学和人类普世同情心,或如孔子所说“对他人的爱,对世间万物的爱”。只有这种尊重自然、尊重尊严、尊重其他生物、民族和文化身份多样性的真正的爱,才有力量和能力移山倒海,打开心灵之门,与其他民族、文化和文明建立桥梁。换言之,就是要克服路上的一切障碍。人类幸福喜悦的未来属于这份爱。这位传奇诗人写下了这些诗句,它们如旗帜飘扬,如中国诗词宝藏中的信号灯、长明灯和指路标,指向中国人民和人类奋斗的宏伟目标:

扞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Lang, Liangzhi, 2022, 第216页)

借这些诗句和李白乐观的诗词,我们就此总结对中国及其博大精深文化和文明的思考,因其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子孙后代即使在21世纪仍在为各国间和平往来与合作交流构建桥梁,以征服人类的星宇雄峰。

## 参考文献:

- Aron, R. (2001). *Peace and War –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remski Karlovci – Novi Sad: Knjižarnica Zorana Stojanovića. [In Serbian]
- Berger, P. (2002).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zeziński, Z. (2012).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zeziński i, Z. (1999). *The Grand Chessboard*. Podgorica: CID. [In Serbian]
- Crnjanski, M. (1923).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yrics*. Beograd: Knjižarnica “Napredak”. [In Serbian]
- Durant, W. (2006). *He Greatest Minds and Ideas of All Time*. Beograd: Narodna knjiga. [In Serbian]
- Galtung, J. (2009).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Beograd: Službeni glasnik. [In Serbian]
- Goleman, D. (2016). *A Force for Good*. Beograd: Geopoetika. [In Serbian]
- Lampton, D. M. (2015).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Beograd: CIRSD. [In Serbian]
- Lang, Ye and Liangzhi, Zhu (2022). *Insights into Chinese Culture*. Novi Sad: Akademska knjiga. [In Serbian]
- Marek, F. (1965). *Philosophy of World Revolution*. Zagreb: Stvarnost. [In Croatian]
- Mitrović, D. (2 April 2023). “China’s politics and economic ris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growth”. *Politika*, pp. 10–11. [In Serbian]
- Mitrović, Lj. R. (2022). *Sociological Marginalia on Contemporary Topics II*. Novi Sad: Prometej. [In Serbian]
- Sklair, L. (2002). *Globalization – capitalism &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ynbee, A., Ikeda, D. (2005). *Choose Life – Dialogue*. Beograd: Dereta. [In Serbian]
- Xi, J. (2023).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Beograd: Albatros plus. [In Serbian]
- Zakaria, F. (2009). *The Post-American World*. Beograd: Heliks. [In Serbian]